

誰是弱勢者？ 一個風險社會的再思考

古允文

壹、前言

隨著「不能沒有你」這部電影受到社會的重視，單親父親的處境也引起大家的注意。2010年3月21日的聯合報出現如下的大幅報導，「單親爸爸心事誰人知？中華單親互助協會指出，社會有愈來愈多的單親爸爸，約占單親家庭的四成二；單親承受多重壓力，以台北市為例，自殺死亡者中八成是單親，其中五成四是單爸，二成六是單媽，不習慣求助的單爸需要社會更多理解…」。

這個新聞現象的背後關係著一個重要議題，社會福利以「弱勢者」作為我們的主要服務對象，男性（尤其是有工作能力的男性）傳統上並不是被視為「弱勢者」，除非他太小（如兒童）、太老（如老人）、或是失能（如身心障礙

者），但在現代社會中男性似乎也無法避免淪為需要關懷的「弱勢者」！這也意味著我們對「誰是弱勢者」的界定，已經到了一個值得重新思考的時候了。

因此，我們在這篇論文中將簡單回顧一些國、內外常用的社會福利導論書籍，看這些作者們如何界定社會福利的主要服務對象，同時也從理論觀點來檢視「強勢者」與「弱勢者」這條線是如何被劃分下來，最後再以當代風險社會的角度重新省思「誰是弱勢者」這個議題。

貳、社會福利相關書籍的弱勢圖像

社會科學作為一個以人類社會為研究對象的知識體系，往往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去界定「什麼人」是社會科學的研究對

象，不同社會科學對此有相異的界定。例如政治學著重於權力的分配，因此主要研究對象會置於「有權力的人或團體」；而經濟學關心市場機制的運作，因此主要研究對象乃著重在「有資源在市場中進行生產與消費的人或團體」。社會福利與工作作為社會科學的一支，加上其源自慈善事業的歷史淵源，則將其焦點放在缺乏權力與資源的人為主要對象，一個典型的例子是O. William Farley等人所著的《社會工作概論》，在切入社會福利與工作的發展時即用以下的描述開始：（何金蘭、詹宜璋譯，2009：21）

「向晚的城市，一對對的人們來到劇院，出席一場電影首映會。群眾湧向了售票口，而引座員也忙著撕票並引導來賓就坐。離這個燈光閃耀的入口處不過三十步左右，站著一個衣衫襤褸、眉頭深鎖的盲人，拉奏著破舊的小提琴，而在他身前則是一個經過日曬雨淋的盤子。有些路人停了一下，丟了幾枚硬幣在盤子上，但多數人只是瞄了一眼，便快步離開。幾乎每家商店，都會有無家可歸的人，在商店門前搭起帆布棚子，以阻擋刺骨的寒風。我們究竟有什麼樣的制度來照顧這些貧困的人呢？又究竟是那種方式最為有效呢？」

這段話相當生動地說明了社會福利關心的議題與對象，更指出社會福利與其他社會科學的差別，於是，「社會福利是針對少數弱勢團體的慈善行為」幾乎已經成

為福利工作者不移的信念與價值。但究竟誰是弱勢者？其界定則存在差異。

在英國社會政策學會（Social Policy Association）為社會福利學生所編撰的《解讀社會政策》（The Student's Companion to Social Policy）書中，界定社會福利的服務對象包括兒童、青年、老人、身心障礙者、單親父母、與移民（李易駿等譯，2006）；而國內學者所集體撰寫的《社會工作與台灣社會》一書則找出貧民、兒童、少年、老人、身心障礙者、婦女、與原住民作為較明顯的服務對象（呂寶靜編，2002）；又如黃源協與蕭文高所著之《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則聚焦服務對象在兒童、少年、身心障礙者、老人、婦女、與原住民（2006）。從這幾本著作簡單的對比中可以觀察出一些現象：

1. 有些人口群是社會福利最核心的服務對象，例如兒少、老人、與身心障礙者，不論東、西方，幾乎都會視之為值得社會福利協助的弱勢者。
2. 但有些人口群則隨著不同社會而有差異，例如英國所關注的青年，在台灣則未被提及；反之，台灣所強調的原住民則未成為英國福利體系的主要服務對象；英國將移民單獨成立，但台灣則將之併入到婦女相關福利之中，特別是針對新移民女性。
3. 性別主流化的福利服務在台灣是個潮

流，但英國似乎更進一步邁向性別平等，也就是不論男性、女性，都應受到平等的對待，例如單親服務就不是只針對單親女性，也可以提供給單親男性。

其實，弱勢者是相對於社會結構而定，而隨著不同時空下的社會結構，弱勢者的形貌不見得一樣。萬育維所著的《社會福利服務：理論與實踐》（2007）就比較站在這樣的觀點上，她援引William Julius Wilson的看法，強調需要福利照顧的對象不是固定的一群人，不是一成不變的同質團體，而是社會變遷與社會結構轉型下，基本與次級需求無法獲得及時與適當滿足的人，這些人之所以被稱為弱勢是因為其生存空間較一般人狹隘，基本權益容易被忽略（萬育維，2007：108-109）。因此在萬育維的書中，不像前幾本書一般非常具體地臚列特定人口團體作為需要福利協助的弱勢者，這樣的觀點也可以在香港的社會福利論述中發現，香港中文大學在1999年與2007年分別出版兩本為華人社會編寫的社會福利論著，即是重要的例子。

1999年在李健正等四位學者的主編下，集合十六位在香港各大學講授社會福利的學者合力出版了《新社會政策》一書，從理論、實踐與課題三方面來探討香港的社會福利，其呈現方式即是以需求為主，討論社會保障、住宅、醫療、教育、勞動等福利需求，只有在論及新的福利課

題時才約略述及香港社會新近產生的新移民（因應97後來港者的增加）與青年（轉型成年過程中的挫折）兩個人口團體，至於老人則被轉化成年齡主義、婦女則轉化成性別歧視議題，意味著我們不能單以老人或女性來界定弱勢者，而是受到社會剝奪與歧視的老人與女性才是。到了2007年，在王卓祺等三位學者的召集下，進一步集合台灣、大陸、香港共二十二位學者出版《兩岸三地社會政策：理論與實務》，聚焦在醫療、失業、退休養老、教育、與扶貧等福利需求議題，分別檢視三個華人社會對這些議題的政策因應與福利措施，在這本書中就再也沒有以特定人口團體作為弱勢者的分類方式，換言之，醫療、失業、退休養老、教育、與扶貧等這些福利需求不是專屬於一個特定人口團體的議題，而是跨階級、跨年齡、跨性別的議題，重點不是因為我是老人（或兒少、身障、婦女）就一定需要福利協助，例如香港首富李嘉誠即是老人，但他不需要社會福利的協助，同樣的情形在台灣諸多工商鉅子身上也適用，需要社會福利協助的老人應是其需求在當時社會結構下無法獲得充分滿足的老人，也才是符合「弱勢者」的界定。

參、福利理論與弱勢者

事實上，爲了找出值得社會福利協助的人，藉此賦予社會福利存在的合法性，諸多福利理論從不同角度切入，也在「強勢者」與「弱勢者」之間劃下界線。這樣的情形早在十九世紀即已開始，例如 Seebom Rowntree 的貧窮生命循環理論，說明人的一生中在兒童期（年幼沒有謀生能力）、中年初期（子女還在依賴階段而食指浩繁）、與老年期（體力衰退生產力下降）最容易掉入貧窮的困境，也賦予社會福利提供協助給兒少與老人的理論依據。

女性主義（feminism）則以性別爲切入點，掌握了社會結構中男、女兩性間的不平等，以及因之而來的所謂「性別盲」的福利政策，尤其著重於批判父權主義式的與以男性家庭生計者爲核心的傳統福利體系（George and Wilding, 1994:130-160）。不論是透過要求女性在教育、就業與社會地位上享有平等的機會（即自由主義式的女性主義論者）、要求女性不要被視爲男性的附庸而享有完整的社會安全給付與普及的公共兒童照顧方案（即社會主義式的女性主義論者）、或是強調女性的獨特性而要求爲女性量身定做各種服務與措施（即激進的女性主義論者），她們都主張女性也是核心的社會經濟構成要素，而應享有與男性一般的同等對待。所以任何「社會福利」絕不能建立在以女性作爲犧牲品的假設上，例如認爲

撫育兒童爲女性的天職（所以男性可以上酒吧而不必待在家裡）、或貶抑婦女爲無酬的家庭勞務工作者（所以不能像有正式工作的男性般享有完整的社會安全保障），如此的「社會福利」只不過是「男性福利」的藉口而已。如同 Pierson 所強調的，女性主義的社會福利分析角度已成爲近十年來福利研究的三大主流之一了（Pierson, 2000）。於是，在女性主義觀點下，「強勢者」是男性、「弱勢者」是女性，因此也提供了婦女相關福利服務的理論依據。

種族主義（racism）則以一個社會裡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關係爲切入點，彰顯出社會裡少數民族的處境，往往沈淪在社會結構與生產關係中的最底層，也使得種族問題與階級問題糾纏在一起，成爲被剝削的對象；尤有甚者，在強勢文化的宰制與洗禮之下，少數民族也逐漸喪失了其傳統的生活方式、文化、信仰與價值，他們不僅是經濟上的少數與弱勢，也是文化上的少數與弱勢。因此，種族主義論者主張提供必要的社會服務（尤其是在教育、訓練與健康方面）給少數民族，但這樣的提供並不是建立在「補償」、「施捨」、甚至只是「吸納」與「同化」，而是建立在社會整體再分配的哲學上，擴展最大的社會福祉，而且這些服務措施必須具備文化的敏感度，尊重少數民族的生活型態，也貼近他們的真正需求（Denney,

1995)。於是，在種族主義觀點下，「強勢者」是多數族群、「弱勢者」是少數族群，因此也提供了原住民相關福利服務的理论依據。

社會凝聚（social solidarity）（又譯為「連帶」或「團結」）則是法國社會學家Emile Durkheim百年前所倡導的重要概念，用以指涉一個社會秩序建構起來的方式，已經從過去強調同質性的機械凝聚轉變為強調異質性但卻互補的有機凝聚。而這也就構成了法國福利國家的核心，亦即立基在互助與危險分攤上所建立起來的凝聚感，將整個社會結合成一個互為保險的社會。但由於經濟活動的日益分化，我們發現某些經濟領域的人們較其他人有著更高的風險；復因政治決策過程未能準確掌握這個變化對社會凝聚的負面影響，致使大家逐漸失去對國家福利的信心，社會秩序的根基因而受到了侵蝕。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更積極地思考與重新界定各種社會方案，某種程度上的選擇性（selectivity）是必要的，但它並不必然意味著具烙印效果、嚴苛的資產調查，或許將這種選擇性的基礎置於較客觀的或生理性的因素上，如身心障礙、年老、夕陽產業的勞工……之類，較能重新建構出適應新時代變化的凝聚感（Rosanvallon, 2000）。於是，在社會凝聚觀點下，「強勢者」是既得利益者、「弱勢者」是損失利益者，因此也提供了身心障礙、農民、

勞工等相對不利者相關福利服務的理论依據。

綠色主義（Greenism）以人與環境生態之間的關係為切入點，企圖建立現代社會的環境生態倫理，隨著其立場強烈程度的不同，又可分為「淺綠」與「深綠」兩大分支。「淺綠」基本上接受現今的世界秩序，也認同經濟穩定成長與消費的重要性，它所要求的只是對環境的友善性，強調「永續經營」觀念必須深植於經濟的成長與消費之中；而「深綠」的立場則較強烈，它認為現代科技並無法解決目前環境生態的問題，除非我們的觀念有了徹底的轉變，也就是放棄不斷的經濟成長與消費，而人類也只是地球上億萬種生物之一，人與萬物是平等的，而不是高高在上或擁有萬物的生殺大權。當這樣的理念轉化應用到社會福利領域時，綠色主義強調普世的平等觀，反對過度強調科層體系與消費的福利國家形式，尤其是伴隨這類福利體系而來的科層（專家）控制與剝削，國際間的貧富差距應該消除，但不是透過永無止境的經濟成長，而是讓人類需求與生態資源更密切契合的永續發展（George and Wilding, 1994:161-188）。於是，在綠色主義觀點下，「強勢者」是人類、「弱勢者」是環境，因此也提供了福利需求滿足必須立基在環境忍受度與永續條件下的理论依據。

全球化（globalization）則掌握資本

主義經濟的全球性脈動與民族國家權力之間的關係作為切入點。一個新的世界經濟已經逐漸成形了，而它也超越了民族國家的藩籬，透過大量跨疆界的貨物與服務的交換、國際間的資本流動、以及科技迅速而廣泛的擴散，世界各國在經濟面上已被緊密的互賴結合在一起。全球化的脈動是超越國家疆界的，也因此對傳統之民族國家的權力產生了衝擊，除了改變自己以因應這樣子的發展趨勢之外，各國並無法透過個別的國家政策來修正、控制、或改變這樣的發展趨勢；其次，如同Mishra所強調的，一個經濟浪潮不但不會舉升起所有的船，它可能還會打翻擊沈許多的船，沒有一個國家會期待自己是被擊沈的船，因而更加激化了國際之間的經濟競爭；最後，這樣的趨勢會對福利國家產生不利的影響，一方面它仍然侷限在民族國家的傳統疆域之內、另一方面消費性的福利給付可能會耗損國家的國際經濟競爭力。也就是在這種思考底下，Giddens乃亟思以「社會投資國家」取代「福利國家」，將消費性的福利支出導向具投資意涵的社會領域（Mullard and Spicker, 1998: 118-129）。於是，在全球化觀點下，「強勢者」是全球經濟整合、「弱勢者」是民族國家，因此也提供了民族國家的社會福利必須強調投資多於消費的理論依據。

肆、社會變遷下的強勢者與弱勢者

然而，上述二分法式界定「強勢者」與「弱勢者」的福利理論，隨著現代社會風險的擴散，顯得有點左支右絀！既然弱勢者的界定會隨社會結構而有所不同，那麼在社會結構變遷之下，「弱勢者」就有可能變成「強勢者」，而「強勢者」也有可能變成「弱勢者」。這樣的情形在福利歷史的發展中屢見不鮮，例如十九世紀的福利發展幾乎是圍繞在勞工階級的需求議題而建立起來的，隨著勞動保障相關法令的確定，二十世紀的福利則逐漸擴大到兒童、身心障礙、婦女、老人等人口群，而在全球化日益升高的影響下，移民也成為各國關注的焦點，尤其是伴隨而來的人口販運問題，更成為評估各國人權的指標之一。

青年議題也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近年來，西方國家學術研究者，因著新自由主義的盛行、經濟全球化的實踐，對社會政策的研究已從福利改革轉向就業領域，其中又以青年就業、及青年生涯轉銜作為就業議題中的核心。青年就業之所以成為社會政策研究與政策的核心，一方面與青年失業率高居不下有關，另一方面，青年失業問題也衍生出更多的社會問題、創造出更多的福利政策需求有關。從OECD指稱青年失業現象及青年非典型就業現象是OECD國家在廿一世紀要面對的首要問題

(OECD,2002)，即可見此一問題被重視的程度。

詳言之，而青年生涯轉銜及青年就業議題之所以被稱為是OECD國家在廿一世紀所要處理的首要問題，主要乃因為青年的生涯轉銜與就業不順利。而青年的生涯轉銜與就業是否順利，至少涉及五層面的問題，而突顯了此一議題的重要：（1）一旦青年無法順利進入勞動市場成為全職工作者，則傳統福利國家設計的原則與前提：「透過就業取得福利資格權及累積風險期保障的資源」，將無法被滿足，而影響福利制度的總體運作。（2）青年如未能就業於勞動市場，而青年／年輕世代作為福利國家的主要財政負擔者，不但無法負擔財務來源（稅收），反將成為福利國家的福利需求者，增加福利負擔。（3）青年若未能就業於勞動市場，不但將影響到青年人的身分認同，又一旦青年成為貧窮者或長期失業者，恐更成為福利依賴者或底層階級（underclass），進而形成社會分層與凝聚力。（4）若社會分層甚至對立的出現，將影響社會治安與基本的社會秩序。（5）青年失業直接挑戰人們傳統認知的一不值得救助的貧民之概念，進而錯亂人們對能力、責任、貧窮的認知。Coles(1995:25)即曾指出，青年完成學業而未能投入勞動市場、成為合適的公民，則社會負擔的代價至少包括：（1）教育與職訓支出：每年必須再額外支出至少20

億英鎊的公共支出於教育與職業訓練。

（2）直接的財政負擔與損失：因著失業津貼而增加的現金支出與減少的稅收，至少超過21億英鎊（以1993年為例）。

（3）因犯罪的直接支出：因青年犯罪的司法直接成本至少達7億英鎊。而以上三大部分的財政支出與負擔這些還不包括其他的間接支出與社會性、非財務性的代價。

但在台灣翻開主要的社會福利論著，幾乎找不到將青年視為主要的福利對象，結果與之相關的福利立法與措施，相對於兒童、老人等其他人口群，也少之又少。這樣結果往往來自於不同世代之間鴻溝，諸多我們這些正值盛年世代的觀點，常常不自覺地隱含強烈指責年輕世代的價值判斷，縱然有些是來自「恨鐵不成鋼」的心理，但更多則是自以為是的刻板印象，「啃老族」此一標籤年輕世代的用語就是一個例子！最近根據勞委會分析主計處資料，發現我國主要長期失業者並非大家想當然爾的「中高齡勞工」，僅占二成七；而是20至34歲的年輕人占最大宗，占總失業人口的49.5%；學歷在大專院校以上者更占四成多數。勞委會對於此一現象表示，現在年輕人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假若無經濟壓力，對工作條件的要求較高，並不願屈就。其次則為年輕人習慣依賴家庭、被過度保護有關，亦即所謂的「啃老族」，這些人長期依賴父母提供經濟資

助，在無經濟壓力的環境下，自然不願主動進入就業市場…。

於是，錯的是年輕人，但真的是如此嗎？其實，青年失業與非典型就業的升高已經不是新聞，我們的研究團隊在93至95年獲國科會補助進行三年的相關研究，即已指出這個趨勢，但當時的勞政部門多還專注在「中高齡勞工」，對此的關注較少。爲了進一步瞭解年輕世代面臨的真實處境，我們特地架設一個網站進行網路調查，除了於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的「就業e網」上建立連結，並請勞委會各就業服務站、各校畢業生服務組鼓勵符合研究對象的受訪者主動連結相關網站，進入問卷選單填答問卷，共計有2,493人完成問卷。我們以失業風險一（是否曾失業、失業期間在一年以下、失業期間在一年以上）與失業風險二（是否曾失業、失業期間與可就業期間比的長短）來看年輕世代的就業處境，結果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綜合失業風險一及失業風險二，家庭階層屬於下階層者的失業風險較高；需負擔家計的青年，其失業風險亦高於無需負擔家計者。

這個發現顛覆了我們對「啃老族」的刻板看法！簡單來說，家境好、有足夠資源供應青年在家「啃老」的，所面臨的失業風險較低，也就較不會成爲「啃老族」；相反地，家境不好、需要想辦法負擔家計的青年，面臨的失業風險較高，還

可能被污名爲「啃老族」，但這其實不是他們所願意的，而是當前社會諸多不平等的發展所致。隨著台灣貧富差距的擴大，好的家庭背景、好的教育、好的職業、好的收入已經成爲一道上升的人生扶梯，他們有資格啃老但卻不會啃老；而在另一端，卻陷入貧窮的循環，他們沒資格啃老卻被迫要啃老（其實，說不定父母自顧不暇，也根本沒有老給他們啃）。此一發現背後隱含兩極化的社會結構，使一部分被貼標籤爲「啃老族」的青年，事實上是處於社會結構的弱勢，但卻未受到現行福利制度的協助。

前述單親父親的處境在台灣引起的關注也是一個例子，在新聞披露之前，國內已有相當多團體辦理單親父親的協助，而2009年一月「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條例」修正爲「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納入單親爸爸及隔代教養家庭，不再只是限於婦女；又如「兩性工作平等法」在2008年一月修正爲「性別工作平等法」，都代表一種新的思維，從社會結構的變遷重新界定需要福利服務的弱勢者。

伍、風險社會下的弱勢界定

所以，當代的「弱勢者」可能不是我們傳統所認知的圖像，也不是特定的階級、年齡、與性別，而是隨著社會結構改變，其承受風險程度有跨階級、年齡、

與性別的擴散。以提出風險社會概念著名的德國社會學者Ulrich Beck曾指出，現代社會已經從工業社會過渡到風險社會（risk society），而如何減少與降低風險社會中存在的生態、人爲風險，決定了管理機構的權威和聲望，以及能否在民眾心中贏得信任與支持的關鍵因素。Beck認為現在產生的風險和福利一樣，是「由現代化本身所導致的危險和不安全」，且風險社會開始於自然和傳統的結束。從自然發生和外部風險到工業化和現代化過程所產生的風險，而風險社會的核心不再是財富的分配，而是風險的分配。在風險社會中，每一個人多多少少都暴露在某種程度的風險下，而所謂的弱勢者即是風險程度高、但擁有資源少的人，但Beck強調，「…風險社會不完全等於階級社會，人們的風險位置不能視同階級位置，他們間的

衝突也不能當作階級衝突」（李易駿等譯，2006：221）。

英國學者Tony Fitzpatrick進一步用脆弱性（vulnerability）來詮釋Beck這句話，他說，「簡單而言，貧窮者的不安全是因為他們意識到自己實際上是脆弱的；而富有的人的不安全是因為他們意識到自己可能是脆弱的」（2001：189）。也就是在風險的威脅下，不論貧窮者或富有的人都擔心自己沒有足夠的資源與能力來抵禦已經產生或可能會產生的風險。在風險社會中，脆弱性是個動態過程，意即未來的事件（風險）所可能造成的福利損失，其程度可以因我們所掌握的風險管理工具多少而有所改變，但隨著一次又一次的風險降臨，人們抵禦風險的能力會越來越弱，最終可能無力回到原來的生活方式與水準（如圖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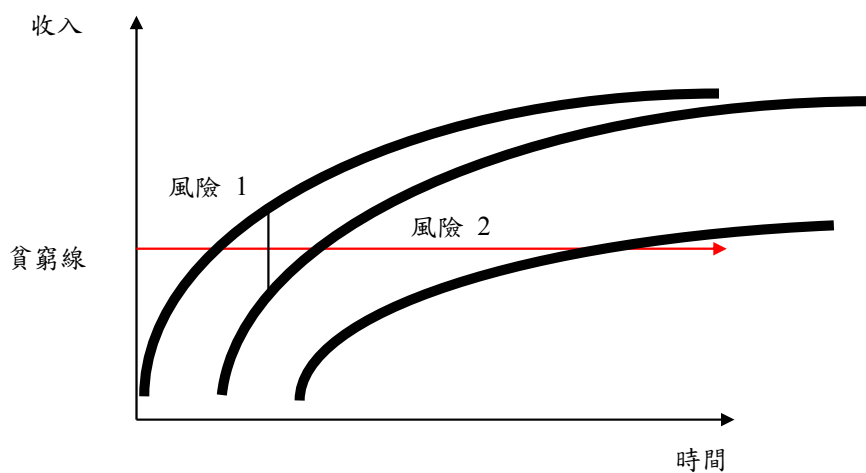


圖1 脆弱性的動態關係

在人類社會的脆弱性與其動態性的框架下，如何降低風險事件的發生機會，協助居

民、民間機構或是政府做好因應風險的準備，危機事件的預警機制，以及災害發生後造成危機狀態，如何從中應變、復原和重建的關鍵影響因素，在於個人、社區、（非）營利組織、與政府擁有多少風險控制工具以及工具間如何有效率、效能的溝通、整合與實踐。因此，風險基礎的社會政策著眼於增加與整合我們所擁有的風險管理工具以抵禦可能產生的風險，預防與避免人們無法回到正軌。

在社會福利發展的歷史脈絡中，1950年代隨著福利國家概念的興起，政府開始扮演作為社會福利服務的主要提供者；而至1970年代福利國家危機的出現、1980年代自由主義思潮的湧現，政府失靈、民營化、私有化的論點成為主流的政策思考模式，退居二線作為補充者的角色成為支持經濟自由的合理化藉口，而政府所應承

擔的職能與角色也在這波浪潮中隨之弱化。然而一個自由市場的社會是不是真的那麼美好？2008年的全球金融風暴也已經證實了市場失靈是如此真實的存在。作為一個政府最核心的職責就是要保障其人民免於受到傷害，而社會政策的推展就是達成這個目的最直接的工具，這個論點背後的邏輯在於政府有能力自社會中匯集更充沛的資源來作為協助人民降低來自風險的不確定性，以及轉換可能隨之而來的衝擊。

讓我們回到風險對社會所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我們用表1來作表示，第一個分類向度是「風險的程度」：屬於輕微、中度或嚴重；另一個分類向度則是「影響的面向」：區分健康、生命歷程、社會、經濟與政治等五個面向。

表1 風險的社會影響

<div>程 度</div> <div>影響面向</div>	輕微	中度	嚴重
健康面向	疾病、受傷	失能	死亡（尤其家庭主要生計者）
生命歷程	家庭結構尚稱完整	需尋求替代性家庭功能	家庭功能難以順利運作
社會面向	暫時的失序	犯罪、家庭暴力	集體暴力、戰爭
經濟面向	財產損失	失業、營生能力喪失	經濟活動崩潰（遷村）
政治面向	政府權威的下降	衝突、對立	政府解組或輪替

不同的影響面向對應著影響程度的差異有著不同的因應方法，也許是藉由個人的能力、家庭與社區的支持、市場的機制，甚至是來自政府的社會政策，然而如何降低風險發生的機會、減輕危機發生後的衝擊，以及如何從危機當中復原、多快復原的關鍵要素，就在於個人所擁有的風險管理工具的多寡。因此，從風險社會的觀點而言，所謂的「弱勢者」就有底下幾個特質：

- 1.其所處的社會與地理位置較易受到風險的威脅，例如社會中較不利的邊緣人口或居住在公共服務較不易輸送到的偏遠地區；
- 2.其可能發生的風險程度是在中度、甚至嚴重程度，因此所導致的福利損失較高；
- 3.其發生風險的面向會是多面向的，例如一個缺乏家庭支持（生命歷程面向）的失能者（健康面向），在社區經濟活動崩潰（經濟面向）的情況下，政府權威無法確保社會秩序（政治面向），而面臨犯罪與暴力的威脅（社會面向），其問題將是十分複雜而且難解；
- 4.發生風險的頻率可能不止一次，因此即使第一次度過了風險的威脅，一次又一次的風險將令其窮於應付、甚至無法度過；
- 5.其手中缺乏風險管理工具，或是即使擁有，但質、量均不足，例如社會中缺乏

普及式的健康照顧措施，無法協助其因應可能出現的健康風險。

不可否認的，階級、年齡、性別等人口特質可能都是影響風險程度的因素，但並不意味著這些是唯一的因素，一個年輕力壯、富工作能力的男性，也可能在經濟景氣急轉直下的情況下，一夜之間成為弱勢者，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下，連向來號稱新貴的科學園區高素質勞動力也放起無薪假，明白驗證了風險的跨階級特性，這即是Beck強調風險社會不完全等於階級社會的深意。

陸、結論

這是一個社會結構快速變遷的時代，過去我們所認為理所當然的社會現象，在新的變化下都面臨必須重新審視的處境，而這正是後現代社會的本質。在過去，社會福利從界定「誰是值得幫助的弱勢者」，賦予自身存在的意義與價值，隨著社會的變遷，「弱勢者」也有了不同的形貌，也就根本地挑戰了傳統的福利措施，因此我們看到，在不同時空之下，社會福利所欲協助的「弱勢者」存在諸多的差異，也產生福利是否足夠與適當的爭議。

那麼，到底誰是台灣的社會福利所欲協助的「弱勢者」？我們必需回到台灣的社會結構中去尋求解答，而風險社會給予我們的啟示是每一個人都可能是「弱勢

者」，即使現在不是、未來也可能是，重點不是因為你的階級、性別、與年齡，而是取決於風險的程度、面向、與頻率，這樣的認知將讓我們對於社會福利有全新的定義，它不再只是針對少數弱勢團體的慈善行為，而是現代風險社會中，所有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於是，社會關懷就不再是一種慈善的施捨，而應是整體的社會氛圍，幫助他人也就等於是在幫助自己，因為說不定自己也會有需要他人協助

的時候。如同許多一百多年的英國社會改革家們發現，原來最安全的環境不在於高聳的城堡，而是讓社會底層的人們都能享有文明健康的生活，唯有如此，我們才不必擔心人們之間的接觸是否帶有不平、惡意、疾病、或是細菌，風險社會的福利觀也正是植根在此種人際信任、關懷、與互助的深層社會結構！（本文作者現為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參考文獻

- 王卓祺等編（2007）。《兩岸三地社會政策：理論與實務》。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 何金蘭、詹宜璋譯（2009）。《社會工作概論》。台北：學富。
- 呂寶靜編（2002）。《社會工作與台灣社會》。台北：巨流。
- 李易駿等譯（2006）。《解讀社會政策》。台北：群學。
- 李健正等編（1999）。《新社會政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 黃源協、蕭文高（2006）。《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台北：雙葉。
- 萬育維（2007）。《社會福利服務：理論與實踐》。台北：三民。
- Coles, Bob (1995). *Youth and Social Policy: Youth Citizenship and Young Careers*. London: UCL Press.
- Denney, David (1995). "Hall", in V. George and R. Page (eds.), *Modern Thinkers on Welfare*, pp. 313-329. Hemel Hempsted: Harvester Wheatsheaf.
- Fitzpatrick, Tony (2001). *Welfare Theory: An Introduc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 George, Vic and Paul Wilding (1994). *Welfare and Ideology*. Hemel Hempsted: Harvester Wheatsheaf.
- Mullard, Maurice and Paul Spicker (1998). *Social Policy in a Changing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OECD (2002). *Employment Outlook*. Paris: OECD.

Pierson, Paul (2000).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State Research" ,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3 (6/7): 791-821.

Rosanvallon, Pierre (2000). *The New Social Question: Rethinking the Welfare Stat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